

風雨滄桑集

徐 放 著

大好河山每一寸土地上都浮着银光烟燎雾绕

南行的列车呀匆匆忙忙便过了沈阳

凭着窗想着你

在遥望着那天边的月这时候

同车人告诉我我们的车子呵

已到了山海关



34341

风雨沧桑集

徐放著

徐放

捐赠 95.



XWTS 0012543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沈阳

(辽)新登字 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沧桑集/徐放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10

ISBN 7-5313-1517-3

I. 风… II. 徐… III. 抒情诗-作品集-中国-现代:当代
IV. I227

风雨沧桑集

FENGYU CANGSANG JI

著 作 者: 徐 放

责任编辑: 邓荫柯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封面设计: 杜凤宝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出版者: 春风文艺出版社 邮 编: 110001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印刷者: 沈阳新华印刷厂

地 址: 沈阳市铁西区建设中路 30 号

发行者: 春风文艺出版社

字 数: 370,000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8 $\frac{1}{2}$

印 数: 1—2000

版 次: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3-1517-3/I·1342

定价: 25.00 元

前言

《辽宁文化名人系列丛书》收录了当代，主要是建国以后辽宁籍和非辽宁籍但长期在辽宁工作过的科学技术、医药卫生、经济、教育、文学艺术等界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作家的代表性著述或作品。他们以其学术成就和著作、作品，享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列入丛书的选题是经过调查研究、专家学者论证、作者精选的。这是一项重大的出版工程。它所推出的名人佳品之多，涉及的学科领域之广，是建国以来辽宁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

辽宁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着丰富的物质资源与优越的自然环境，是一方人杰地灵的宝地，曾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创造了昔日的辉煌。今天，面对新的历史任务，正肩负重任，顽强地开拓创新，一个崭新的更美好的辽宁将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在创造新生活的人们中，文化名人



前言

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典型代表。这是辽宁的昨天、今天,以至于明天历史的客观存在。

本丛书所呈献的一批名人佳作,是让人们了解他们对事业的忠诚,在学术上的探索与建树,在创作上的突破,在人生道路上的执著追求……总之,试图将名人的智慧之光展现出来。这是辽宁出版界奉献给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沉甸甸的、光闪闪的,文化名人将同他们的著述一起永存人间;既是我们共创大业的知识宝库,也是立身进取的榜样。

由于操作此类选题的经验与学识的不足,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留下的缺点也是难免的,望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本书得以面世,曾蒙许多专家、学者的热情指点,得到省领导的亲切关怀与有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辽宁文化名人系列丛书》编委会

1995年8月1日





徐放 小传

徐放，1921年11月28日生于辽宁辽阳农村。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抗战后期毕业于东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44年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川北分会理事及机关刊物《文学期刊》编委。后，主编过《东北文化》周刊。1946年7月，内战爆发后第一批撤退到延安，先后任教于陕甘宁边区陇东中学、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艺术学院文学系、华北解放区华北大学三部（文艺学院）文学系兼文艺研究室研究员。1949年调人民日报社，任副刊、“星期文艺”、“人民文艺”专版及文教编辑。同严辰一起主编过建国后第一套诗歌丛书《现实诗丛》（共12部）。1955年，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蒙冤坐狱、劳改、遣





返回辽阳东部山区（俗称东山）务农，前后达二十几年。1979年调回人民日报社。1980年彻底平反。后为该报群工部负责人之一和高级记者、高级编辑。现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公共关系研究所所长，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湖北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客座、名誉教授，江南诗词学会名誉会长、辽海诗社名誉社长和中国《水浒》学会等多种学会理事、顾问。出版诗集有：《南城草》（1942年）、《起程的人》（1945年）、《野狼湾》（1950年）、《赶路记》（1954年）、《白色花》（20人集，1981年）、《徐放诗选》（1986年）、《情和爱之歌》（1991年）及《唐诗今译》（1984年）、《杜甫诗今译》（1985年）、《宋诗今译》（1986年）、《陆游诗今译》（1988年）、《唐诗绝句选译》（1992年）、《宋诗绝句选译》（1993年）以及中篇小说《群》（1941年）和有关《水浒》作者施耐庵的调查报告等等。





胡
风

徐
放
的
诗

1944年，我住在重庆乡下。一天，一位戴着草帽的青年从城内步行了几十里路来看我。他从怀里拿出了一卷诗稿，要我给他看看。原来他是从沦亡的东北经过艰险的途程漂流了以万里计的祖国大地，来到了这古老的祖国西部的四川，寻求友谊，寻求斗争的道路，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目标。

我读了他的诗稿，果然，跳跃着的是这样一个从亡国惨痛下面长程苦斗的、祖国儿子的心。在我的眼里出现了辽阔而富饶的东北大地，出现了在敌人统治下忍受着生活的困苦，但却坚强不屈地寻求活路的东北人民。

送别的时候，我望着他的似有所得的欢快姿态和走上生疏的道路毫不疑虑的健康的身影，不禁感到一种不能给予他一点有益



的助力的、不安的怅惘。

这就是徐放。

那以来，经过了抗日战争后期的对国民党反动压迫的沉闷的坚持，经过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激烈的变化，迎来了祖国大地上朝阳普照的风光。徐放，他劳动，他学习，他工作，他斗争，他热切地但却谨慎地随着历史步伐的前进而前进。但他在繁忙的劳动和组织性的工作中间，始终不能忘情的，是诗，是在诗形式里抒写他的爱憎和他的悲欢。他自己歌唱，他更鼓励年轻的伙伴们歌唱。他热情地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歌者为洗除旧中国的污秽而歌唱，为迎接新中国灿烂的新生阳光而歌唱。在解放初期，他争取到了一点条件，热忱地编印了一套《现实诗丛》，向新中国的青年读者送去了虽然不厚但却是诚恳的礼品。

除写诗外，他还用纪初阳的笔名写了一些杂文和表现新生的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的报告。如他的笔名所表现的，他散布了祖国新生的阳光。

那以来，经过了反反复复的斗争，尤其是十年内乱的激烈变化，徐放当然不能不接受了严酷的考验。在别离了二十多年后的重逢中，知道他下放到环境艰苦的东北的乡下接受劳动锻炼。问到经过情况时，他只简单地回答：“放牛！学大寨！”

回答得这样简单，反而说明了那决不是这样简单。望着他和二十多年前几乎没有大变化的面容，不能不想到，他是承受住了考验的。



现在，他把他的诗选成了一个总集，要我看一看。我匆匆地读过后，意外地发现了 he 走过的祖国大地有那么广阔；似乎 he 每走过一个地方，都要凭吊那个地方的历史经历，并赞赏它的现实动态，记录下了他的心声。对古老的故事的心声，对现实的人民奋斗经历的心声，总之是，一个中国大地的儿子的心声。

徐放是，禁不住要对古老的祖国的故事和残迹发生他的感应，通过他的感应来表现作为一个土地的儿子 he 内心的悲伤和希望。

他更禁不住对新生的祖国劳动人民的精神生活发生感动和向往，通过这些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的信仰和追求。

近年来，他更使他的信仰和追求拓大到了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礼赞上面，这更表现了徐放作为人民诗人的特色，国际主义的特色。

我还没有能力具体评价徐放的诗，只好凭我的印象介绍这个诗人。虽然是诗人的一斑，但却是我实感到的一斑。愿读者和他向过去告别的感情一同告别，和他对现实激动的感情一同激动，和他向未来追求的感情一同追求。愿读者从他诗里吸收能够有的真诚的情愫。

1984年5月5日

（原载《徐放诗选》）



我的诗路历程

代序

1921年11月28日，我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县城西北65华里的一个叫沟子沿村的地主家庭里。那正是“张大帅”当权时代。5岁时候，便开了蒙，上了家里设立的“私塾”，跟从在我们家乡那一带地方颇有声望的塾师吴乐天先生学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1928年6月4日，发生了“皇姑屯事件”，1928年12月29日，在张学良将军“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下，东北“易帜”，南北统一了，又上了村里的小学。这时候，跟倪溥泉先生学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和“牛大姐，马二哥，青草地，吃青草”之类。唱的则是“苏武留胡节不辱”和“日本小鬼真正顽，夺我旅顺大连湾”等等。此外，我喜欢的则是韩小窗先生编的那些“唱本”和长工董五叔教唱的民歌和小曲。用后来有些同志的说



法，我本应上音乐学院，成为一个男低音歌手，但没有。不仅没有，而且从1931年9月18日夜里沈阳北大营一声炮响，“天下马蹄乱了”，家从乡下搬进城里，在小学老师孙世泽先生的熏陶下，竟“误入歧途”，走上了学习着写诗的道路，并迄无成就。

但学习着写诗，也使我从30年代末期便开始抒发出了我的那些反帝、反封建的，特别是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也正因为这样，我没有学好日文，而走上了“反满抗日”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待到1942年，我刚刚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诗集《南城草》，在东北又发生了一起“12·30”事件，由于遭到日伪的通缉，乃逃亡入关，进入已流亡到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1943年，我便参加了党的外围秘密组织“东北救亡总会”，在学校期间，则参加了南方局青委领导的秘密“读书会”（这时已学习并讨论过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是学生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当时，在所谓“大后方”的高等学校中有一个“壁报拒检”运动，便是由我和一批进步同学发起的。1944年，我和老师陆侃如、冯沅君、赵纪彬、杨荣国、董每戡、叶丁易、姚雪垠，及同学刘黑枷等一起，组织并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川北分会的理事和会刊《文学期刊》的编委（主编为陆侃如先生）。使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由于分会的成立，我还联系了一大批身在射洪的进步青年，如



宋貂音、李天倪、王稻心、王怒安等，他们并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出版了《文学青年》杂志，在川北地区产生了很大反响。

在四川三台东北大学期间，可以说是我诗歌创作生涯中最为活跃和充实的一个时期，但至今还使我感到非常难过的是：我当时把这些作品曾编成一个题名为《明天的旅程》的集子，竟在由“五十年代出版社”送交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查后，被扣压、没收了，而且其中的大部分诗稿已不可再得。胡风先生曾答应为我这本集子写序，并把他的一些意见，在寄给我的一封长信中都表白了。他大致是说：我过去由于是生活、抗争在殖民地的高度黑暗统治压抑之下，同全新的革命的战斗生活（胡风先生在这里指的是由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或战斗气息隔离着，无法参加到有组织的全新的革命的战斗行列中来，可是又对伟大的祖国抱有热切的向往，对祖国过去的的光荣有着深情的恋念，怀有一颗痛切的、深沉的忧国忧民之心，因此，便难免不在旧诗词中所常有的“忧患意识”和“兴亡之感”中寄托自己的那种忠愤义烈的、乃至凄伤悲楚的情怀。胡风先生曾明确地为我指出，说我的诗对于为人生总的战斗去向的达到点上，也许不一定能增加夺目的光彩和惊人的功绩；但因为这些诗是真情的、诚恳的，不同于一般文字匠们的词藻堆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些诗里所表现的人生，最低可以给“大后方”污浊腐朽的生活之流里



流进一些清新的气息，带进一些刺痛和不快，让那些混度生活、玩忽岁月、脑满肠肥的人们看看这种人生，知道中国还有一大半天地是在敌人的铁蹄之下呻吟，从而使他们清醒清醒，一扫残山剩水之间的颓废和污腐，还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

还记得当时，在东北大学的诸多社团中，由我领导的“黑土地社”，是很富于战斗力的。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社团，是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大旗之下团结起来、用文学形式同国民党进行战斗的社团，成员们都是在南方局青委的领导之下，不仅思想认识一致、步调一致，而且目标也一致。“黑土地社”的成员，没有一个不是先后都到了解放区的，没有谁不是党的忠实的信徒的。所以，当时“黑土地社”的许多师生，都被视为党的外围，并被监视着。有些同志都上了特务的黑名单，而我则被视为“奸伪小组组长”。我这一时期的诗作，可以《妈妈的黑手》和《起程的人》为代表。前者，我塑造的是一个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求生的、善良的农村劳动妇女性格；后者，是我送一位战友去解放区的“赠别”诗，用鲁煤同志的话讲，“难解难分的战友情肠，留连低回的惜别心绪，构成了一曲现代战斗者的《阳关三叠》。”

如果说，在诗歌创作上，我在东北大学度过的，是我一生中“充满着少年风怀和青春情调的黄金时代”，还带有一定的稚气，那么，到了重庆之后，我在诗歌创作上，则进入了一个比较接近于更成熟的时期。胡风



先生对我的影响是深重的，特别是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一和第二义诗人的理论。我总记着他“第一是人生上的战士，其次才是艺术上的诗人”这些话。所以，在重庆这一时期，是我真正直面人生的时期。时间虽然不长，但，充满着革命者的节概和英雄般的豪迈之情。而我这一时期的作品，除大部分因躲避敌人的搜查，而投掷在运河之中了，尚能代表我的成果的，应当说是我在去延安之前写的那首《在动乱的城记》了。这时，淤积在我心中的痛苦、悲哀、愤怒、仇恨和热爱及追求，都喷发了出来。用鲁煤的评语说，这是我在蒋管区三年中奋勇搏战、历经迫害的感受的总汇和结晶。在这首诗中，我不仅控诉了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悲悼了各种人士的无辜牺牲，表达了一个革命者誓死不屈的意志；而且应该说，整个调子是向上的，昂扬的。这是一首一个普通革命者的悲歌，也是普通一兵的战歌。值得提到的是：我这一时期的诗作，多与过去呈现着一种不同的风采，那便是：我真正地走向了“七月派”，一方面在反对着旧的格律束缚，一方面也获得了散文的美。而“七月派”的风格特点，我理解，主要是他们的诗，都充满着强烈的、巨大的感情的力量，都充满着蓬勃的生机，极富于感染力、鼓动力和说服力。而他们所要求的，也主要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之美。同时，他们对为屈原所奠定的，而又为历代诗人所发扬的那种感时忧国、关心社会和民族存亡的精神，都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而这，也可以说正是中国诗歌传



统的灵魂和生命。

在重庆，我主要还参加了中共南方局青委直接领导的东北青年新民主主义小组，以教书为公开职业，进行地下工作，从事民主运动。任过《东北文化》周刊主编，曾团结过大批东北流亡青年，组织他们从事各种进步活动或组织他们去解放区，同反动派进行斗争。我同时也是中华全国诗歌音乐工作者协会的会员，中国人权保卫大同盟的盟员，和由王亚平主持的“春草诗社”的理论部长。总之，在重庆，我进行了许多活动，结识了许多老一辈的和同辈的学者、诗人和作家。

1946年6月，我由重庆《新华日报》到了南京《新华日报》。因该报被迫停刊，内战已经开始，我乃于7月初同《新华日报》的部分同志，第一批撤退，回到了延安。我到延安那天，《解放日报》已经发表了题为《全解放区的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社论。

使我深感惋惜的是：我到延安时，大多数文艺工作者都“下山”了，我见到的诗人只剩下了一位柯仲平同志。他给过我许多鼓励，并要我留在边区文联工作，但在组织的安排下，我终于骑着匹牲口，同另外几个同志一起，到陇东分区的陇东中学教书去了。

回到延安，回到边区，我真的感觉是回到了自己的家，“像孩子，打远方归来，睡在妈妈的怀里”一样。而且，我是满怀信心，要“绑上草鞋，背起背包，到乡下去，投入火热的斗争”。这一时期，我可以说是满怀著



欢欣，如醉如痴地在歌唱着新的生活，新的农民，认真地实践着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

到陇东分区的次年2月26日，胡宗南的部队开始进攻陇东分区的驿马关，3月便侵占了延安，我所在的陇东中学的师生于5月4日改编成了游击队，之初我们是转战在三边地区，待到除“一野”外全部撤出陕甘宁边区，我则从晋西北被分配去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去了。直到1948年7月，为迎接华北全部解放，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边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也随之在正定合并成华北大学，我又到了华北大学第三部（文艺学院）任教兼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直到后来进城接管北平。

这期间，我除打过游击，做过收复区工作，参加过土地征购和土地改革等等，也当过新华社太行分社的特派记者。可以代表我这一时期的作品，应该说主要是在陕甘宁写的“转战手记之一”的《野狼湾》，和在晋冀鲁豫写土改斗争的《万廷元说的》。我觉得，在这两首诗中，我又恢复了我过去在《妈妈的黑手》中所特有的那种乡土风格，我并没有套用当时流行的某种固定的民歌形式，而采用的完全是自由诗的形式。我觉得，这可能更具有鲜明的群众风格。在北方大学的一次讨论新诗创作的会上，针对某种过分强调学习民歌形式的意见，我曾明确地提出：写诗，是在现实生活中，随着生活的惊涛骇浪，运用生活中活的语言，无拘无束

